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明史学者钱海岳之死	白门读史
【往事非烟】	谁是吴希庸	尚德馥
【恐怖岁月】	朱振邦的悲剧——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	阿陀
【往事追忆】	《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王橙宇
【人物春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三）	萧木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明史学者钱海岳之死

• 白门读史 •

1968年，不少学者教授以被动或主动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成为文革受难者。其中有这样一位教授，他研究了一辈子明史，最终终结生命的地点也和明王朝有关——他被人挟持到明孝陵的明楼之上，推下身亡。

他，就是著名南明史学者钱海岳先生。

钱海岳，190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钱麟书曾任安徽绩溪知县。受到家庭影响，钱海岳从小就以文名著称乡里，被称目为“神童”。

1925年，钱海岳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著名学者。后历任新疆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等职。

1950年7月，钱海岳去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分配至苏州市博物馆工作，后又调江苏博物馆工作。1960年，他调到南京图书馆，此后，他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之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兼授南明史，直至去世。

钱海岳一生著有《哀蝉落叶集》、《浣花楼诗集》、《明清故宫词》、《重修清史商榷》、《吴越国故迹考》、《禹迹考》、《订补历代州域形势》等，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煌煌三百万言的纪传体巨著《南明史》。

钱海岳生前未曾见过的外孙女堵力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称自己的外公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写了这部《南明史》。

钱海岳是从1920年代开始南明史研究和写作的。1931年，他开始撰写《南明史》，至1944年完成100卷书稿，1968年，他去世前已补充至120卷。

此书是唯一按照“本纪、志、表、列传”的志书体例写成的南明史书，将南明历史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8年，延续到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汉人政权的“明政时期”，共计四十年。

钱海岳为何要研究南明，并撰写《南明史》？与先生所处的大时代背景有关。

堵力写道：“日本人侵略中华之前阴谋策划了100多年。他们早期就把老师定位成女真人，一直对清朝的崛起史极度感兴趣。女真弹丸之地，小小一支人马，却长驱直入，将整个大明的花花江山生吞活剥又消化良好。那整套作战部署、统治哲学都成了日本上层学习的教材。后来，他们又以建造满洲铁路为名，深入中国腹地，四处搜罗情报，才逐渐画出侵华的路线图。”

这应该是钱海岳将毕生大部分精力，投入南明史研究的最主要原因。“撰写一部悲剧史书，探寻出明末中国是怎么众不敌寡以强落败，被打得跪地投降的，以帮助同胞抗日，帮助未来的中国找到相反的经验 and 出路”，并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激发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

钱海岳要从南明的痛史中总结出对当世有益的历史经验。

在亲友的记忆中，钱海岳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不善于做交际，“书呆子”型，只知道埋头著书，无法八面玲珑于学界与官场，不能发动学生、周围人共同快速成书。

钱海岳的孙子钱廷元回忆，祖父少言寡语、外表冷漠。只要不上班，就会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他那时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收集、研究和考证南明史的资料”。在南京生活时，钱海岳经常带着钱廷元去明孝陵，看着明孝陵的宫阙和石兽，思考明朝的衰败和灭亡。

而在另一些亲戚的印象中，钱海岳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在家几乎不说话，最大的情绪发泄就是读书，且记忆力超群。每天，他都要抽出时间来吟诵古书，声音朗朗，摇头晃脑。60多岁的人，找资料的时候，能清楚地知道哪本书在第几个书柜的第几行第几本，甚至知道要找的内容在第几页。

堵力出生之前，钱海岳已离世，她对外公的印象都是外婆给予的：左手举着一根烟，几乎没心思抽一口，直烧到手。

《南明史》，煌煌三百万字，也受到同时代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肯定。柳亚子先生为《南明史》题写书名；谢国桢先生将《南明史》的凡例、序言收入自己的代表作《晚明史籍考》增订本中，并对这部巨著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顾颉刚对钱海岳和《南明史》颇为赞许：“余当一九七一年四月承周总理命，主点校二十四史，参加出版会议，即曾提出寻求此书。次于明史后，清史稿之前。时同人以为应俟二十四史点校完成后再议。今全书已完成矣，此稿适出，其当与国家出版局及中华书局主事者共商之，俾不没钱氏以四十余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也。”

曾主持《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顾颉刚认为,《南明史》可列入正史,“应置《明史》之后”,“足备一代文献”。他还多次说过,无锡这地方出人才,“在史学界我熟悉的一个是钱穆,一个是钱海岳。”

作为后人,堵力则如此评价外公的著作:“历史研究要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天天论证当时人穿什么衣服、怎么上朝,说到底不会有生命力。历史,一定要做成民族治乱循环的镜子,才有意义。司马迁说藏诸名山五百年,就是这个意思。”

但这样一位与世无争亦无害的学者,在文革狂飙初起的1968年,却被残忍地迫害致死。

因为在书中肯定了郑成功的功绩,《南明史》被诬陷为“宣传蒋介石反攻大陆”,遭到飞来横祸。

1968年初,造反派将钱海岳挟持到明孝陵,带到了明楼(明孝陵宝顶之前的建筑,高达16.25米)之上,方城之前,将钱海岳先生推下,活活摔死。

这个研究了南明史一辈子的学者,最终惨死在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之前,令人扼腕和感慨。

钱海岳死后,《南明史》书稿也被查抄而流落民间,其万卷藏书也被红卫兵烧毁。一直到1979年,经过家人的多方寻访,才找回《南明史》稿本,包括96卷誊清稿和24卷草稿。

又经过了27年,2006年,中华书局在钱海岳亲属后人的支持下,对稿本进行整理,这一史学巨著终于得以正式出版。全书计14册、120卷、350万字。

在《钱海岳:一生只做南明史》一文中,堵力如此追忆自己不曾谋面的外公:“他在物质上没有留给他的子女任何东西,但他却和我的外婆以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行了无言之教:在顺境中谨慎、逆境中坚韧,保持做人的底线,保持对民族的忠诚。足矣!

综合钱海岳后人回忆文章写成,特此感谢!

□ 来源:微信号“飞刀看书”

~~~~~

【往事非烟】

谁是吴希庸

• 尚德馥 •

在我刚刚过了85岁生日的第4天,我失去了相爱63年,即将携手走进钻石婚的老伴。在那些哀痛的日子里,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吴希庸先生遗书里的一段话:我走了,你们会嚎啕大哭,十分难过,但下一个星期天,你们仍会聚在一起,包饺子……先贤点化了我——当亲人走向另一个世界时候,留下的人坚强,愉快的生活下去是对他的爱和不舍的最好回答。当日,儿子把先生的话分享在亲友的微信群里。孩子们问我:谁是吴希庸?好吧,我就来讲讲吴希庸的故事……

吴希庸，辽宁辽阳人，1911年7月24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生。8岁失怙。16岁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东北大学化学系，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因倡言抗日，被官方逼迫离校。后赴法国深造，入南锡大学（Universite Nancy），改习经济，钻研三年，于193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时年，20岁。

吴希庸学成后即刻归国，受聘于东北大学，成为该校史上最年轻的经济教授。他在25岁时完成的著作《人口思想史》叙述古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口思想及人口政策，力图通过讨论人口问题，分析人口/资源分布，为国家的治理提供参考。书一出版，即被誉为“诚空前巨制也”。此书被再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4月（河南人民出版社）（2），再次证明了它的学术价值。

东北人吴希庸，把对家乡的热爱溶进了他的研究里。他是系统研究“闯关东”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的第一人。他在30岁时发表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3）被列为了解东北近代历史和东北经济史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提及“闯关东”研究，必提吴希庸；

从事移民问题研究，必读吴希庸的书。

1937年，26岁的吴希庸与著名学者冯友兰（1895—1990），傅斯年（1896—1950）何廉（1895—1975）一起被列入辞典馆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4）。

有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双睿目的吴希庸，不仅是个怀揣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学者。他更是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

他是东北大学的爱国先生讲演团的三大主讲之一：召唤东北人民捍卫自己主权，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修筑满蒙五路。（5）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省教育厅厅长高惜冰联络知名人士在北平组建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创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青年。他应高惜冰之邀赴察，专司督学及民众教育，实践其“国家开放，必先树植人才”的主张。（6）

1933年9月后。省立东北大学向内地流亡搬迁，由沈阳而北平，而开封而西安，而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在搬迁岁月中，他俱在东大任教。共历时11年半，受聘为经济学系教授，曾兼系主任，并一度任训导长。（7）

1944年冬，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从军。奔赴重庆，成为青年军中的指导员，并兼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经济学教授。（8）

在以吴希庸为代表的爱国教授们的感召下，无数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生于1910年。曾为东北大学学生，9。18后流亡关内，毕业于北京大学。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辞去教职，离家抗日。1941年投笔从戎加入东北挺进军）。

1949年后，吴希庸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视线。有着在国民政府中和军中任职经历的吴希庸，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捱过日子可谓是“如履薄冰”。1956年，他受聘于北京铁道学

院（现北京交通大学），三级教授。直至1968年离世，除了与别人合作编写的《铁路史话》（9），他没有再发表过任何东西。然而，他的教授丰采依旧。在那个重理轻文，认为只有学好数理化才能走遍天下的年代，他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虽为这所工科院校的副科，却依然是堂堂爆满，窗台上都坐了人，窗外还有人站着听。

我于50年代中期在北京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前夕试讲。评委里有吴希庸教授。那时的先生已很少在会上发言了。但对我的试讲，他破例点评了很多。先生夸我“思路清晰，论述有理有据……。适合做教师”。还就如何控制节奏和把握时间做了详细的指导。尽管当时就有政治敏感者私下议论为何先生对我独有青睐，我却始终为能得到先生的亲口肯定和具体点拨感到荣幸和骄傲。我毕业后留校，跟先生成了同事。从助教到教授，无论是教书还是作学问，吴希庸教授始终是我的楷模。

吴希庸先生自然没能躲过文革的腥风血雨。至今我还记得鱼湖边，食堂门口，每天三顿饭前，那一群颤颤巍巍，汗流浹背，被逼着低头请罪，唱“我是牛鬼蛇神”的教授们……先生终于不甘受辱，选择愤然辞世。他的死，到底让一些整人者作了恶梦。从那日起，造反派对教授们的体罚和人身侮辱相对收敛。当年与吴教授一起挨整的经济系主任赵传云教授曾在会上感慨：“是吴希庸救了我们”。

北京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名录里没有提吴希庸。他与在文革中自杀的知识精英们一起载入历史：“吴希庸，1911年生，辽宁省辽阳人，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曾经到法国学习经济并获博士学位。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批斗和毒打。于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杀”。（10）

谁是吴希庸？谁还记得吴希庸？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会忘记他。我更希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他。因为吴希庸先生用他一生的奋斗实践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更以他短暂的57岁的生命诠释了中国儒者“士可杀不可辱”的刚毅。

参考文献：

- （1）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以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0年
- （2）《人口思想史》，作者：吴希庸，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
- （3）《近代东北移民史略》，《近代东北集刊》1941年第2期
- （4）《民国名人图鉴》，杨家骆编，民国26年（1937年）辞典馆出版
- （5）《孙西林烈士传略》，李万新，赵宁，2011年
- （6）《高惜冰先生传略》，《吴希庸先生传略》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一，2016
- （7）《动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张在军，2015年
- （8）《抗战末期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孙玉芹，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刘敬忠，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14年
- （9）《铁路史话》金士宣，吴希庸，1965年
- （10）文革中被逼自杀的知识精英105人名录，浙江大学教授张允若，2016年

~~~~~

【恐怖岁月】

朱振邦的悲剧——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寄宿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周日晚上七点钟以前必须回校参加自习，但是那天上午突然有同学匆匆骑车来家通知：马上提前回校，班主任将召开班、团干部紧急会议，有重要事情宣布。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发生过。

下午两点钟，我们（广州八中）初三（2）十几个班团干部，准时集中到班主任汤仲霖老师的化学科组办公室。原来这是一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会。自从六月二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校园里空气越来越紧张，大家都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

平时就不拘言笑的汤老师这天更倍加严肃：“……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个团员、干部一定要站稳党的立场，特别要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我不可能复述42年前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其中几句。

盛夏，午后，五平方左右的小房间热得像个蒸笼，唯一的一把电风扇扇起阵阵热风，把我们每个人都熏得晕晕乎乎。我既激动又惴惴不安。史诗《东方红》有一句：“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么幸福”。其实我们那时的许多年轻人内心正好相反。从我们懂事开始，被灌输的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只是我当时万万没想到，随后八中第一个跳出来贴大字报的学生的立刻成了“右派学生”。我没有当右派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当这种左派的觉悟，一时无所适从。

(二)

当晚自修下课以后，学生大部分都回到宿舍，洗刷准备就寝。突然传来消息——校友楼（校门塔楼）出现了大字报！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丢下手边的一切，从四面八方各个宿舍奔向校门……。

八中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十个为什么？——质问八中党支部》，主要内容是批评支部领导运动不够得力。作者署名“高二（3）班朱振邦”。

这张大字报立刻起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点火作用。当时因为有中央公开肯定的北京大学聂元梓在前，全国各地城市大中学的普遍情势已如同干柴烈火，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人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立刻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响应、跟进（事后各地的文革史证明无一例外）。朱同学的大字报其实只是一时冲动的模仿之作，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大多数同学也并不太在意大字报讲些什么，只把它当作一个行动讯号。于是在熄灯钟响了以后无人就寝，所有的学生宿舍和课室都像炸了锅，学生跑上跑下，连夜找来总务科老师开门领毛笔，墨汁和白纸，又敲开食堂大门，要求大师傅立刻烧开水冲出一大桶一大桶糰糊。校园彻夜灯火通明，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和老师都被点名批判。矛头所指是全方位的，但首当其冲的主要是一个“摘帽右派”

和几个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特别是语文和英语教师。既然报纸号召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些人自然成了最现成的靶子。

第一张大字报还起了另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把批判矛头部分引向学校党支部。这岂不是57年右派反党的重演？于是学生中很快就自发出现一批反驳朱振邦，维护党支部的大字报。与此同时，由于有聂元梓榜样的鼓舞，也有一部分同学从另一个角度领会中央的运动精神，跃跃欲试想要摸摸老虎屁股，于是起而拥护朱振邦。

笔者当时取折中的立场，不做简单的是非判断，先做调查研究。记得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对立两派大字报的统计数量和主要观点整理出来，写成一张大字报贴在食堂门口，呼吁双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冷静平等讨论；二是找朱振邦本人和高二（3）的同学了解情况。

六月七日（八日？），笔者上了北楼二楼高二（3）教室，当时该班刚刚开完批判会，铁青着脸的班主任郭世思老师正在擦黑板上的标语。大部分同学都散去了，朱振邦还留在原来的座位上。我向认识的同学问了几句，就上前坐到朱的身旁。朱完全不理睬我，神色茫然低头自言自语“我没反党！我没反党……。”

郭老师也是我们的政治课教员，平时给我们的印象是特别革命，朴素却不可亲，有点高深莫测。他的眼镜腿永远是用胶布缠的，这并不奇怪，当时许多学生都是这样，可他是老师啊？当然老师可以提倡艰苦朴素嘛，不过常常穿着汗迹斑斑的背心，一长一短卷起两个裤脚，赤着脚走进教室，这就让人觉得怪怪的了。他的课，全班最高分都很难拿到八十以上。革命的标准答案似乎永远深藏在不拘言笑的郭老师眼镜片背后。郭老师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个捍卫革命的沙威——多少年后，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会想。

形势急转直下，深入调查已不可能。

随后余波不息，郭世思老师被部分学生作为“野心家”“小爬虫”揪出批斗。关押期间，郭写入党申请（血？）书。此事竟然惊动当时在北京的第四号大人物，原中南局书记陶铸，指示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八中右派学生斗左派老师，要处理！……。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们正在南北楼之间的林荫里开什么小组会，看见校道上出现一对身材瘦小的老夫妇，有人说是朱振邦的父母，来校好像是要澄清朱的家庭成分什么的。朱此时已神经错乱，被接回家休养。

此后文革波涛的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朱振邦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下乡海南两年以后，忽然听到同学中传来关于朱振邦的匪夷所思的消息：有一天，朱的父亲正在午睡，朱振邦突然狂性大发，举起菜刀冲进房砍向父亲，把父亲的头颅斩断滚落地板，他一边喃喃自语：“斩断狗头”“斩断狗头”（笔者注：此系当时流行文革术语）……。

——朱振邦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39年后，笔者继续完成当年中断的调查……。

（三）

二零零七年六月日，笔者回国期间，通过黄巨源同学牵线，约见到原高二（3）同学，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以后又陆续访问了另一些同学和老师，初步了解到八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前后以及朱振邦本人的一些情况，综合如下：

在同班同学眼中，朱振邦非常聪颖，天分过人，老实厚道，胸无城府，有点书呆子气。

朱父是华南工学院颇有名气的留美教授。朱出生在海外，五三年（约六岁左右）随父亲回国定居。他的见识自然比一般国内同学要广一些，加上领悟能力特别强，知识水平也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例如高中期间他就写信给《航空知识》，指出其中一篇文章的错误，并收到杂志回信感谢和表扬。但朱政治上比较幼稚，他竟告诉同学美国生活比中国好，这在当时是犯忌的。朱生活自理能力也较差，衣裤脏了，浸浸水，捞起来湿漉漉挂在窗架上晾干就算洗过了，要不就干脆周末带回家交给保姆洗。他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单纯，热情，幼稚，毫无防人之心。

六六年六月五日，星期天傍晚返校途中，朱刚好和家也在华工的同班同学潘瑞瑜同车。一路上两个人谈起华师附中已出现了给党支部提意见的大字报，八中却没有动静。是不是党支部领导不力？朱提议也写一张大字报给党支部提提意见。

潘表示同意：你来写，我签名。但回到学校以后，潘马上就被叫去开学生干部会了，朱完成这张大字报后代潘署上名字，两个人联名的方式贴了出去。

第二天《羊城晚报》要派人下来了解情况。事前诸兆祥校长找潘谈话：你是干部子弟，又是培养对象，只要站稳立场，运动过后还可以入党。既然大字报不是自己署名，上面来人问起，你可以说你是受蒙蔽的。朱振邦的情况比较复杂，这是阶级斗争。潘觉得领导的意思好像就是想整朱振邦，但自己确实是同意写这张大字报的，应该实事求是……。

朱振邦也对潘说，大字报是我贴出去的，你不承认就可以。潘没有接受这番好意。

以后，学校通过班主任郭世思老师给朱施加了很大压力，朱很快神经崩溃，来回不停地走，喃喃自语，于是被家长接回家去了。

六六年底，学校出现了许许多多群众组织，其中高二（3）成立了一个“愚公移山战斗队”，宗旨就是要为朱平反。同年十二月，“红色造反团”派人找到原工作组组长刘瑞松，刘签字同意为朱振邦平反。随后红色造反团发起召开平反大会。主持人是高三学生梁校南，会上发言的有高三（3）张穗生和高二（3）郭进兴等。朱的父母也来了。会后张穗生等几位同学陪朱的父母一同前往芳村精神病院探望朱。

朱经过治疗，病情亦一度控制，后来突然狂性大发，据说是因为工学院整天开着高音喇叭，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他受了刺激之故。

朱杀父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了较长一段时间。出院以后，一度表面上和正常人没有明显的不同，有一次见到潘瑞瑜，还表示很想和班上的同学联系，但自己做了那样的事，担心大家会不会怪他？潘安慰他说，那是文革造成的（同学都能理解）。没问题，几时聚会一定叫你！可惜没等到朱振邦期盼的这一天，不久他的病情又恶化了。据说这次是因为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对肝脏造成了伤害。大约73还是74年，朱振邦同学终于英年早逝。

~~~~~



## 【往事追忆】

《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 王橙宇 •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

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

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得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来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回。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话“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 来源：“五柳村”网站

~~~~~  
【人物春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三）  
——《张春桥传》代跋

• 萧 木 •

（上接 z k 1 7 0 8 c）

（八）“批”与“保”：毛泽东背水一战

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十大”前夕复出，大概是曾经作为“走资派”被批判而愿意悔改的一个代表，可能带有示范的含义。但后来形势的发展，邓成了接替周恩来几乎把文革派击垮的主帅。

1973年四月九日，从下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到西郊玉泉山去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周恩来。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见面后谈话一开始，周就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因在座还有邓的夫人卓琳，周又特地叮嘱一句：“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此前中央早已把《“571”工程纪要》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材料”发至全国，《纪要》“实施要点”中就有抓到张春桥“立即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的话，所以张是“叛徒”的说法已广为人知，不再是秘密；但对此说法中央高层意见不一，周持肯定态度，毛则“不让查”，在当时仍属“绝密”级重大政治信息。周在邓刚回到北京即以此党内机密相告，很可能有希望与邓达成某种“默契”，以便联起手来共同对付越来越受到毛信用的张的含义。周与邓历史上颇多矛盾，文革初期周还曾刘、邓并提对邓作过批判，但“九·一三事件”后，当毛开始考虑让邓复出时，周是积极促成的。此时周已查出患有膀胱癌，不难理解，无论从革命经历、政治见解或思想感情，周宁愿让邓来接替他的位置，决不想看到权力落入张之手。

“十大”后不久，发生了一个政治局内部的“批周事件”。在当时，这一事件本身已让我们这些约略知道一点内情的人感到意外，更大为吃惊的是邓在批周会上的一次发言。

那段时间王洪文已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部分日常工作。据王说主席对批周会议很重视，他要每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此每次会后，王就把全部会议记录带回钓鱼台十六楼他的办公室来，要他的秘书小沈再端端正正用相等于一号大小的字体重抄一遍，而且指定要用6B

铅笔写，好让患有深度白内障的毛泽东看起来方便些。由于工作量很大，小沈每夜熬通宵也还来不及，我就去帮他抄一部分。在我的印象中，张春桥的发言还是比较缓和的，主要是认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负有责任；江青则指责周在中美谈判中搞了“投降主义”，是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真有点像“开帽子工厂”。但记忆最深的还是邓小平的发言。邓当着周的面说的大意是：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那时我和小沈对周都十分敬重，对他能抱病参加这些批判他的会议原已很同情，那夜看到这段邓发言的记录就不由议论起来，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再加无限上纲，很为周感到委屈，为他抱不平。数十年后经过世事人事沧桑几度，如今回过头去再想想，觉得事情恐怕并不像我们当时想象那么简单。很可能邓的话就是说给毛听的，他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一种方式向周发出这样的警告，正由于它没有事实根据，似乎更能显出刚刚复出的他对毛的一片忠诚。周听了是否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委屈、不平，恐怕也不一定。凭周丰富的仕途经验，不难读懂这或许正是复出后的邓的一种“进身术”，因而他会仍然相信与邓在对付张的问题上曾经有过的“默契”。这也就是说，既然要“联手”，就不能不承受相应的代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邓的批周，就有了“周瑜打黄盖”的某些含义。也许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1975年五月十八日，刚从国外出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得休息，就赶到三〇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送给周一件不寻常的礼物——当年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周抚摩着这种独特的面包，一切尽在不言中。

“批周事件”几个月后的1974年四月六日，由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美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作了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长篇讲话，世界各通讯社纷纷报道，让刚复出的邓小平来了个“闪亮登场”。从这时起到第二年八、九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多就是邓小平。从中央来说，也正是这段时间，是十年文革中最为云谲波诡的一个历史时期，许多史实至今还在云遮雾罩中，有待专家学者去考订、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

其中特别费人猜思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文革派是一个“四人帮”小宗派，并在1974年七月十七日和1975年五月三日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其实“十大”后的文革派或者说“四人帮”的几个人，也已经各怀心思、矛盾重重，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把以为既有党的副主席的职位、又较容易控制的王洪文拉在一起，还成立了一个我也曾参加过的专门处理全国各地主要是造反派写给江或王有关“批林批孔”大量来信的四人小组，每天要出好几期《要信摘报》，上报毛泽东和分送在京各政治局委员，江在上面不断有所批示，想用这样一种办法把运动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料此时王背后又出来了个叶剑英。叶因“十大”时支持王洪文而批评了许世友，让王颇为感激。王与叶又是一起钓鱼，又是一起打猎，叶还调拨给王一套在玉泉山的特地经过高规格装修的楼房，大概也是想把王拉过去吧？江为此气得大光其火，要张春桥管管王。偏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其背景是，邓颖超很可能是根据周恩来的主意或意图，用了访问“康办”大院所有上海市委领导住家却偏偏不去张家这么一种巧妙的方式，等于公开宣布：张家问题严重，大家都要离远点！迫于这种无形却强大的压力，张从此不便再回上海，时间一长，对市委工作状况就变得颇为生疏。而与此同时，已升任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却经常通过某个市委书记直接向市委发指示。借用文革中的流行语来说，这该是上海市委一个近似“多中心”的时期，从而导致市委几位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原已存在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经王洪文同意、市委三位书记联合批示，对市委写作组主办的文艺刊物《朝霞》发起了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朝霞》事件”，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又一次“内讧”。三位书记是在没有报告在北京的第

一书记张春桥的情况下作出批示的，这种做法不说是反张，也至少是一种擅权行为，更何况发起批判的“罪名”纯属莫须有。尽管事件经张果断而又谨慎的處理和王洪文认识错误后的积极配合，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张对王由此留下的戒心，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所以这回江要张“管管王”，张既不便管、不好管，大概也不怎么愿意管吧？除此之外，张对“批林批孔”中江、王那些明显不符合毛意图的做法，估计也不会赞同，后来他与姚文元谈起江、王在某次会上的讲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是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不过文革派在对待功臣派的态度上，大体还是一致的。在上述毛泽东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批评“四人帮”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文革派与功臣派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1974年三月二十二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内部提议向中央作出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等积极支持，江青激烈反对。张春桥不见有什么表示，从他后来据说“因病”没有出席讨论邓率团出国相关文件的政治局会议来看，内心大概也是不赞成的。二是1974年九、十月间，两派对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争论日趋激烈。十月四日，在武汉休养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十月十七日，江青把王、张、姚找到她所在的钓鱼台十七楼一起商量，决定由王去见毛，汇报双方的争论，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医院就有关人事安排问题多次找人谈话等情况。因此时毛已转到长沙休养，王此行后来被称为“长沙告状”、“阴谋组阁”。三是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1975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谈到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时，引了毛泽东1958年八月庐山会议上关于学习理论的一段话，其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接着说：“据我看，毛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与此同时，姚文元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也引了毛的这段话，认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一日《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作出表态：“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在紧接斗着四月二十七日由邓小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对张、姚等反对经验主义作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毛泽东在相隔近一年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文革派江、王、张、姚等人的批评，重点是指出他们在上述三次争论中搞了宗派活动，而不是他们提不同意见的错误。如在前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之间，一次与李先念的谈话中批评了江青，说她“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在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批评文革派搞宗派活动，应是事实。如上面说的“长沙告状”，尽管王洪文当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完全正常；但他此行是江青事先找了少数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的，就属宗派活动。不过公平地说，功臣派不仅也搞宗派活动，而且搞得更多、更厉害，近年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都有详尽记述。如说经过两次手术的周恩来，依然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接连约人谈话、批阅文件，以至负责治疗的医生不得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减少周的这些活动，以免影响休息和睡眠。前传中还引录了纪登奎的一段回忆。纪说：“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指周恩来）在

三〇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过七次。最后提出了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当然这一切，传记作者都是作为周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念念不忘与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感人事迹来写的，但却忘了想一想：像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这样的事，把一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委员完全排斥在外，这种做法正常吗？如果“四人帮”反咬一口说周恩来等也是在搞“宗派活动”、“阴谋组阁”，该怎么回答呢？

不过在这里，我以为更需要也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还不是传记作者观察历史采用了什么视角，而是：此时仍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不知道功臣派也搞了宗派活动，更何况王洪文“长沙告状”告的主要也就是这方面内容，但他却偏偏只批评文革派而不批评功臣派，这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说几句关于“派”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的确如此。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必然会提出不同诉求，因而在现代国家里，众说纷纭，政见杂陈，出现各种派别以至公开的反对派，都是极正常的事。大概由于我们国家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传统太深远的缘故吧，往往把“交结朋党”视为一种严重的罪名，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大体也还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况到文革一开始发生了新奇的变化，不仅群众中出现了各种派，而且大会小会都在呼喊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政治派别、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组织策略作个粗浅的概括，那就是：依靠文革派，发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文革派开始主要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那时全国上下都知道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宣传也是这个基调。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宣布过：“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后来，毛领导下的文革派与竭力推崇文革的军官集团派和支持或赞同文革的部分功臣派结成同盟，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明确“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在此前后毛的一些重要指示以至重大决策，包括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生日谈话》，不少是只与文革派少数几个人说一下就付诸实施的，要说宗派活动这也是一种宗派活动，只是好像从未有人这样想、当然更没有人这样说过。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夺权斗争的迅猛发展，先是文革派几位大员接连出局，继而军官集团派纷纷落马，七零八落的文革派最后还剩下毛泽东和江、张、姚、王五人。所以国外流行一种说法，叫“五人帮”，不叫“四人帮”。那么毛为什么过去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批评了他们的宗派活动呢？我的理解是由于形势出现了转折性的大变化。这种大变化了的新形势，已非一般调整性的措施所能挽回，而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文革全面退潮。权衡利弊，恐怕只有果断采取根本性的大动作，或许还有可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保住文革基本成果，不失时机地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完成。

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是“九·一三事件”。这个重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心和民情以及权力构成两个方面。

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突然“机毁人亡”，大多数人起初震惊，接着惘然，其中不少人转而开始思考。作这样思考的较多是运动中曾受到过批判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保守派群众，但也有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和文革的积极投入者。狂热的激情慢慢趋于冷静，虔诚

的信仰渐渐有所疑虑。这种思考虽然还没有公开化，但它汇成的力量不容小视，更为重要的是队伍还在迅速扩大。广大的基层工农群众，他们的想法则要实际得多。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以为闹腾了这么些年，他们并没有得到些什么。1975年夏秋王洪文与纪登奎一起奉命去杭州“解决浙江问题”，我作为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先后在杭州、萧山、金华、兰溪、宁波等地做调查，多次听到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在当地叫“顺口溜”：“盼过九大盼十大，盼过十大盼人大；人大开过了，还是一点没啥啥！”以上是人心和民情的变化。还有是权力构成的变化。“庐山会议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解决的“军队问题”，以“十大”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标志已基本完成。其时军队干部因“三支两军”而进入各级权力机构并成为主要领导的，大多已陆续退出。而造反派好些地方因长期打派仗，加上经过此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他们的头头多数在群众中又缺少信任度，实际上也很难掌好权。再说造反派头头们在一月夺权阶段之所以威风十足，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组织、有队伍；大联合后，各个造反组织实际上全都取消，队伍也散了伙，剩下几个“光杆司令”就变得无足轻重。有的还不甘心，就拉些“游兵散勇”动不动找点事情出来闹闹，自然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各省市军队干部退出后的那些缺位，几乎全由复出的老干部来接替。与此同时，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运动中曾经受过冲击的老干部，也纷纷复出。如果说“九大”后是军官集团派一派独大的话，那么此时的功臣派不只是一派独大，甚至可说已颇有“一统天下”之势。

密切关注着这种新形势的文革统帅毛泽东，决定作出新的部署。1974年八月下旬，一条“最新指示”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传遍了大江南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尽管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时似乎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全部理想目标，但他的这段话，实际上透露了准备“提前”结束文革、意欲以此保护已经取得的文革成果的信息。根据这一新的部署，多少有点出于无奈，却也是断然、决然地作出了三项决策，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次妥协和退让，因而显出几分破釜沉舟式的悲壮，所以我称它为“背水一战”。

第一，重新构想人事布局。这就是上面已提到过的王洪文赴长沙“告状”，毛泽东批评了文革派的宗派活动，让周恩来、王洪文一起来商谈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这已是“九大”后的第三次布局。与“十大”的文革派为主、功臣派为辅的布局不同，这次倒过来了：以功臣派为主、文革派为辅。最大的特点是由邓小平接替已患有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位置。如果与毛发动文革的理想目标作个比较，显然较为接近的是“十大”的布局而不是四届人大的布局。之所以必须作出这样的改变，就是鉴于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新布局的提出，说明王洪文已失去了“接班人”的资格，毛已承认在安排“接班人”问题上的又一次也即第三次失败，不得不从理想回到了现实。一些文革著作包括民间传言，大都称王洪文为“扶不起来的阿斗”。我则以为毛的弃王，与王个人的品质、才干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主要还是迫于形势。王进入毛的视野，除了王“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主要还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而此时，不少省市的一些造反派头头由于上文已说到的种种原因反而成了“不安定因素”，“批林批孔”刚开始时有的省市造反派又拉起队伍提出要“第二次夺权”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时能够掌控和稳定局势的只能是功臣派，邓小平的重要性就这样突现了出来。当然，毛构想这一布局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要尽可能保护文革基本成果。基于同一思考，对邓的如此重用有一前提条件：邓必须实践他自己向毛作出过的保证：对文革初期曾经受到过的批判“永不翻案”。

第二，提出并批评“四人帮”。如果联系一下此前八年文革史，和毛本人曾经宣布过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就可以知道这对毛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出的大



动作。张等三人，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的得力助手，王更是毛费尽心思从基层提升上来的体现文革胜利成果的标志。吴德在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两处提到，“十大”后毛在他住处中南海游泳池找政治局人谈话时曾指着窗外蔬菜地说，对王、张、江、姚就要像培育蔬菜秧苗那样细心培育他们。而在1949年以来的政治语境中“帮”或“派”都被视为非法的，如今这四个人竟掉到了“帮”的境地，这是何等大的落差啊！而且你仔细想想，“四人帮”这个名称就大有讲究。不称“文革派”或“极左派”而叫“四人帮”，就是要将人数限定在“四”上。看来，作为曾经是文革派首领的毛泽东就是想用这样一个行动宣布，他已从文革派退出，与文革派不再有任何联系。如果把文革发展过程中前后的斗争形式作个比较，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集权体制必须严禁派和派别活动，文革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只有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才允许它们出现和存在。它们的使命是两条：消灭“走资派”和消灭自己，从而回复到更加集中统一的政治秩序。尽管毛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始终拥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权力，但如果不退出某个派，从理论上说就不会有高于派别的权威和公信力，就不可能有评判、调解各派的资格。毛带头退出了文革派，就有了这种资格，就可以向各个派别发出警告：现在已是“消灭自己”的时候，从此谁也不许再搞派和派别活动。所以我的理解是，毛批“四人帮”的宗派运动，不言而喻，也是对功臣派的无声警告：你们也不能搞派和派别活动。事实上对功臣派也曾有过警示，只是不说是批评，而是提醒。如提醒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提醒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不要搞‘三人帮’”等。

但要“消灭自己”，对不少曾经在“派”的人来说，可是一大难关。“消灭走资派”，他们可以豪情万丈，到了要消灭“自己”，却是那样勉强以至痛苦，不少省市造反派的“大联合”之所以如此旷日持久甚至派仗连连，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类似的勉强以至痛苦，轮到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文革派。有一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大致有了上述人事布局构想后，第一步就是提议邓小平任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毛希望文革派能够主动跟上他的思路，但又担心他们很难做到，且先做个测试。他告知周恩来这一提议时特地关照一句：“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所以邓任团长事是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来的。果然，江青一看就坚决反对，还扬言要外交部收回报告。最后毛不得不自己写信告知江：此事“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还有王洪文，甚至到毛已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搞宗派活后的1974年十月，还不知道毛已退出文革派，从此不许再搞宗派活动。王到长沙后写给毛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个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你看，在王心目中，毛依然是他们的“派头头”。读着这样的信，毛的感受大概是四个字：啼笑皆非。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表现是沉默，几乎不说什么话。我的猜想他也是痛苦的：苦于不知如何来重新认识和追上毛的思路。

第三，“批”为了“保”。这是与上面第二项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看得很清楚，在当时形势下，对文革派四个人，只有通过批才能保，“批”正是为了“保”。这一点，从他整个批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点名批评的只是江青一个，张、姚更始终没有提到。这除了江确实闹得比较厉害，还因为她是毛的夫人。毛这样做对其余三人是一种警策，对功臣派除了慰抚，恐怕还隐含着已经退到底线的一种宣告：我把老婆都批成这样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再如，即使对点了名的江青，也特地说明：“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还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毛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提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谁出任时，毛与周有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对话。先是周接连提出了三个人选，毛显然都不同意，却突然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罗荣桓。”周不由一怔。罗原曾任此职，但此时已作古多年。待周已反应过来，毛笑着说：“还是由春桥兼任吧。”周这时再次提出了张的“叛徒”等历史问题，毛的回答是四个字：“已经知道。”后来张不仅兼任总政主任，还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最后是1

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后，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提出了处理的方式：“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毛泽东这位兼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的政治家，在上面提到的五月三日那次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上，还与与会者和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一个充满着东方式政治智慧的谜。

会议临近结束，毛忽而说起了三国孙权的故事。也许是“十大”期间叶剑英在批评许世友反对王洪文上去时，曾讲过孙权起用周瑜故事的缘故吧，这时毛又让叶来吟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脍炙人口的咏史词直接说到孙权的有这样一些名句：“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还有曹操的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会后，王洪文要我找些资料，给他解释一下这首词。当时我的解释只是“就词论词”，肯定远离了毛泽东奥妙的用意。因为我没有说明：因何一个主要是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却要借这首词来做结束语？但我相信，功臣派中总会有人能读懂毛的深意，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愿意真正照着做。

#### （九）邓小平—华国锋—邓小平

邓小平是实干家，一首词就是一首词，何况还是七、八百年前一个古人写的，什么深意浅意，他大概不会有兴趣。接下去他便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作中心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这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把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的整顿雷厉风行地推向各部门、各系统、各省市，推向高潮。整顿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毋庸讳言，整派性实际上就是整造反派。不过也应当说，其时文革已闹了八、九年，人心思治，所以邓的大搞整顿，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与此同时，邓又着手把思想、教育以至文艺等领域的领导权以及编辑《毛选》五卷的任务，也全都抓到自己手上来。办法是，重新起用胡乔木等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叫“政治研究室”的特别机构，和一个《毛选》整理小组。这两个机构实际是一套班子。再把通常称作“学部”也即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那支人数众多而又训练有素的理论队伍，也划归这套班子去管。接着又紧锣密鼓地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明显有与此时还由姚文元分管着的《红旗》杂志来一个分庭抗礼的预期。1974年年末，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商谈人事安排时，明确提出：“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以“铁腕”著闻邓小平，通过上述这套措施，短短三两个月就把张、姚挤到了半“靠边”状态。紧接着，又向被认为是张春桥“基地”上海发起了攻势。此前，上海已因“《朝霞》事件”引发了结合在市委的几个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的一场“内讧”，这一回邓小平准备再去找市委几个老干部做做工作，从而在张的这个“基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与周恩来一样，邓也是利用了一次陪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时间是1975年六月十五日。这天晚上送走外宾后，邓把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叫到他下榻处瑞金花园作了一次长谈。先透露了一点政治局两派斗争和毛批评张、姚在反“经验主义”问题上的错误等“内部消息”，接着谈了些当前工作，对马说着重要大胆批派性，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开会，可以多找找国务院的老同志，先念同志，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谈嘛！”邓与马的这次谈话，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称为“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上述邓小平批判文革派和大搞整顿的整个过程，都在毛泽东密切关注和细心的观察中。六月初，毛与邓曾有过一次很可能是充满着玄机的谈话。毛先称赞邓工作“有成绩”，接着说：文革派“他们几个人不行了”，“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鼓励邓“把工作干起来”。邓说他“有决心”，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笑着突然说出了八个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语出三国李康《运命论》。就看你这位实干家怎么去理解。

现在再来说说张春桥在这段时间中的心态。

大概是1975年三、四月间吧，张在日趋激烈的中央内部两派斗争中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无奈只好向写报告提出与感情一直很好的妻子文静离婚，已获批准，只是还没有办理法定手续。不仅如此。就像我在第二节中已提到过的那样，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因毛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钓”的话而相继搬出，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这年秋冬，约有两三个月身体又不怎么好，低烧老是退不下来，夕阳下，常一个人在钓鱼台中心湖畔散步。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最为艰难、苦闷，却也是相对较为“清闲”的一个时期。

记不清具体日子，北京已经很冷，大概是十月末或十一月初吧，一天我去看张，见他站在办公桌旁像是很专心的打扑克。这是一个人玩的一种游戏，叫《打通关》。据说很能锻炼智力和耐心。后来楼里服务员对我说：“这段时间首长出去开会比过去少得多，有好几次看到他一个人在打扑克。办公室的清洁工作也是他自己做的，我们都快失业啦！”

张看到我就收起了扑克牌。坐下来说话时，我笑着随口问了声：有没有打通？他点了根烟，很高兴地说：“非常难得，这一回打通啦！”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此前对邓小平说过的“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那句话应验了，中国政坛“风向”果然又一次大变。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抓住邓小平两次向他转送清华大学党委一位领导反映学校新干部思想作风等问题的来信作为契机，开始对邓在大搞整顿中反映出来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等问题提出批评。接着，先在政治局内部从四人、八人、十七人的小范围，逐步扩大到先后两次“打招呼”会，继而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再扩展到各个领域，进而又从北京推进到全国，发动了一场以批邓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名称就叫“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今人们读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简直莫名其妙！但毛泽东却以为有充足理由。这是因为当初重新起用邓时就设定了一条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维护文革基本成果，邓也做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邓的大搞整顿冲破了这条底线。所以毛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政治局内部批邓时，开头一段时间王、张、江、姚等几个人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偶或有点插话。毛特地让联络员传达他的意见：“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尽管实际上邓一直是把张作为主要对手来较量的，但毛却偏偏没有提到张也要发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这位极富东方式智慧的政治家，总是不断给当时和后人出智力测试题，这里又是一个。

这年十二月下旬，由外交部提出、经毛泽东批准，张春桥到柬埔寨出访了一次，是对已经来访过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回访。因属于内部相互访问，不作公开报道。回国那天到机场迎接的中央领导人只有一位，就是正在接受批判的邓小平。在舷梯旁握过手，坐进车子，两人似乎都有些不自然，一路无话。车子进入市区，邓忽然说：“到大会堂聚一聚

吧？”张爽朗应答一声：“好，聚一聚。”原来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往年此日，大都由周恩来发起，请政治局在京委员到大会堂同进一餐寿面。而此时周已在医院病床上进入弥留之际。窗外天空彤云密布，大雪纷飞。张与邓落座后，一起举杯说了声：“为主席健康。”似乎都还想说几句舒快一点的话，但终于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直到各自闷头吃完碗中的面。

再过三十五天便是1976年春节，农历岁次丙辰，俗称龙年。1976年二月三日是龙年正月初四，就是在钓鱼台也偶尔可以隐隐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竹声。正是在这样喜庆的气氛中，我收到了张春桥写的一篇读中央一号文件感想的文章，也即后来被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政治报告中认定张篡党夺权“铁证”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有关张写《有感》的前后经过，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传》已录。有必要重复说一下的是这样一点：《有感》是张为教育、鼓励我而写的，因我在那些年里对形势看法较为悲观，他就用中央前后两个一号文件时间仅隔一年形势已发生了“新桃换旧符”的大转变这一事实，向我说明应当乐观，与什么“反对华国锋”毫不相干。其实这也用不着我来噜苏，相信只要不带成见，任何人把这篇不到两百个字的《有感》读一遍，都会认为“来得快，垮得也快”那些话，是对1975年一号文件后出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说的；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出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有着刻骨仇恨和妄图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相反，文中对1976年一号文件也即新任命为代总理的华国锋的出场，特意铺衬了一个“千门万户曈曈日”的春意盎然的背景，这反映了作者对华莅任新职的一种喜悦之情，只不过用的是文学手法。退一万步说，即使张在《有感》中有对华不敬之词，也只是让我一个人看过，随即锁进了保险柜，最多也只能勉强定个“诽谤未遂”罪吧？而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先把张抓起来，再破门而入，撬开保险柜抄出了这篇《有感》，便作为唯一“罪证”向世人公布，这叫什么呀？

当然，张春桥是个政治人物，他支持华出任代总理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对他自己政治上升沉进退的考量。当时，有可能竞争此位的，只有三人：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张自己，只会动动笔杆子，并无尺寸战功，在经历了中央高层两次“大闹”、由毛泽东牵头与林彪的“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和险遭灭顶的“庐山会议事件”等教训，再加上那柄虽然纯属虚构却一样锋利无比的“叛徒”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还悬在头顶，早该有了自知之明，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剩下的，就是华和王。如果要张在两人之间作个选择，他选择的肯定是华而不是王。这除了在当时那种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之下，王上去同样无法稳定局面以外，还有一个属于张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那就是“《朝霞》事件”给他留下的对王的戒心，此时大概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想就容易想到：王一旦接班，历史上吕不韦那个教训会不会重演？而当时，张对华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张在与姚谈话时也说与华“能合作，就是不大交心”。张对华说过：“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我在与张接触中，觉得他还是保留着相当多的文人气质，更愿意自己是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是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由华接班，他在一旁辅佐，不顶在第一线，省却不少麻烦事，或许还有可能抽出时间来完成早有“野心”的《毛泽东传》的写作，大概更符合他对自己的理想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文革十年，张在追随毛和毛的思想、指示行事这一点上，可谓坚定不移，且始终如一。让华出任代总理，从当时的特定意义上说实际上也即让华接班，是毛“九大”后第四次、“十大”后第二次人事布局。尽管毛说得仿佛很随便：“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个期水平低的。”但张完全能够理解，选择华，是在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下，毛仍然希望既能保留文革基本成果，又能团结大多数的良苦用心。华在党内属中年，经历兼有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初期曾受过一点冲击，后期更多的是受益，可说是典型的中间派，既能获得功臣派的支持，也容易为文革派所接受。更何况，毛还事先通过联络员分别向张、王打过招呼，要他们“让一让”，张

当然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所以我以为张支持华确系出自真心，他对因事或因开会来北京的马天水、徐景贤等上海市委领导，也说过“要支持国锋同志工作”一类话。

一些回忆文章大都称华国锋为人厚道，我参加过有限的几次由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留下的印象也是这样。说话总是面带宽厚的微笑，对与会者包括我这个工作人员都很尊重，对张春桥尤为敬重，逢到某个问题要做结论或决定，总会先问一句：“春桥同志，你看呢？”但华同样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已是接近顶级的政治人物。人，一旦登上了如此高位，很少有人还能自将，大多会处于一种超越常情的精神状态，此时支配他思维和行事的已不是原来的情性譬如厚道，而是那些冷冰冰的政治博弈规则。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手起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月政变”。

其实毛泽东在世时对此类事早有预警，现在可以查到记录的就有两次。一次是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1967年九月毛在与张等谈话时提醒说：你们不要多讲我个人，讲多了“马克思叫我走了”，你们“要吃亏的”。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已经流传得很广的毛与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等说的那番话，时间是1976年六月中旬。其时毛病情已相当严重，可能预感到“马克思叫我走”的日子就要到来，所以从谈话中透露出来的警示含义也更为直接和严峻。先说了他一生做了“打倒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又说这两件事都还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说到这里，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眼前大概已浮现起历代帝王权力传承之际那惨酷的一幕幕，于是接下去依然用平静口气说出的四个字，却是那样令人不寒而栗：“搞不好，就要血风腥雨了。”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声长长的喟叹，寄寓着这位病危中的老人和伟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是多么希望不要出现“血风腥雨”啊！

现在已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毛的后一次警示即“血风腥雨”那番话不可采信。主要的、也是相当有力的根据，就是华国锋本人否认毛曾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我的看法可能有点另类。我以为华的否认，恰恰证明毛确实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之所以要否认，就因为毛正是当着华、张、王、汪等人的面，含蓄地警示不要搞“血风腥雨”，而华却偏偏搞了“血风腥雨”。

不过华国锋毕竟是厚道人，他在搞过“一举粉碎”后就不由心虚胆寒起来。为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场合说明，他这样做是“执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第一次还是在毛的灵柩前深深鞠了三躬以后说的。但这却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你把包括人家老婆、侄子在内全都“一举粉碎”了，这人世间竟有如此“执行遗愿”的吗？如果那个睡着的老人还能开口，你还胆敢说这种话吗？

紧接着，华国锋就让党中央、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署名作出决定，加速出版《毛选》五卷，并以举国之力，大搞遗体保存和修建纪念堂等等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前些年我在写新史话体断代史《大秦帝国》时，又不由想起了文革中这段接近落幕的历史。《大秦帝国》第九章是写平庸无能的二世胡亥是如何通过与赵高、李斯联手用政变方式继位的。胡亥登极后的第一个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就是竭尽天下奇珍异宝和能工巧匠穷奢极侈地为始皇大帝举行葬礼。我把胡亥这种做法概括为“借光术”：他想借用先皇宏大的威光，一夜之间光大自己。恕我不敬。我暗自想：华国锋的上述种种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是

否也有点像在搞“借光术”呢？他急于想为自己塑造一个最忠实于毛，最坚决执行毛遗愿、遗志，无愧于像毛说的那样“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形象。后来又有人把华的这种策略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两个凡是”。

但紧接着发生的事却说明，“人一走，茶已凉”，“你办事，我放心”很快过了有效期，“借光术”并不管用，“两个凡是”也失去了号召力。《庄子·山木》中有一则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正是抓住华国锋“两个凡是”这件法宝，倒过来把它变成一种罪名，先除去华的“左臂右膀”，再请华本人“自愿”向中央提出辞呈。于是百般无奈的华国锋，只好自己摘下了头上那顶才戴了两三年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的高冠。

邓小平搞掉华国锋当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中国，几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有个老规矩，那就是得按照资历和战功来排座次。你华国锋算老几呢，扳扳指头排一下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坐头把交椅啦？

至此，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安排同样宣告失败，文革这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终于降下了大幕。

#### （一〇）大幕降落，张春桥做了个梦

张春桥先是关在地下防空室，后是囚禁在秦城监狱，“看”完了文革这部历史大剧的最后一幕。张曾对人说过：“毛主席去世后，我的生命已经终结。”说得准确些，应该是作为政治人物的生命已经终结。此前张还曾不止一次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人，一旦解脱了尘世荣辱升沉以至生老病死的羁绊，回归到一个赤条条的大自然的人，便获得了彻底的自由。被抓了起来的张春桥，面对那些一律拎着黑皮包的，先是中央专案组、接着是中央纪委、最后是特别法庭的大员们，无论是循循善诱的软攻还是疾言厉色的硬逼，他都是一副定格似的表情：微微偏着头，抿着嘴，既不忧伤也不激愤，带着几分自信和自傲，还有几丝不屑，从容自若，淡然自定。这当然要被办案人员斥为“顽抗到底”的恶劣表现。有位著名的漫画家还据以画过一幅同样著名的漫画，题目叫《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却以为“不怕开水烫”的张春桥，倒正是他获得了彻底自由的一种反映。

我猜想，如今的人们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在高墙铁窗下度过了那么些年，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被称为“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春桥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否也有一些改变了呢？我手头有一份张的狱中家书复印件，写信的时间是1992年十二月二十日，再过六天就是毛泽东诞辰九十九周年，所以信的大部分篇幅是叙述张与毛关系，从1938年在延安第一次听毛报告留下的印象，一直说到文革十年历次与毛接触的感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了人，把蒋从鬼变成了人”，据说这是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100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1927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这些话难免会引起不少人批评。真是顽固不化啊！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反思精神”，怎么就不能“与时俱进”一下呢？批评当然很正确，不过我还是稍稍有些担心：要真是那样，这个人还是二十四岁创作《毛泽东之歌》，五十过后又立下“野心”要写《毛泽东传》的张春桥吗？

1998年一月，服刑二十一年后的张春桥，被从囚禁于秦城监狱改为软禁于江苏江阴某地，也即后来新华社公开报道中说的“保外就医”。那是在偏僻乡野的一座三层小楼房，因四周新砌了高高的围墙模样十分奇特，远远望去便可一眼认出。小楼之北隔着一座不高的山，便是昼夜涛声不息的长江。张住的是二楼，安全可以绝对保证：三楼和底楼全是换上了便衣的警卫。正是在这里，经过有关部门先后逐一批准，张终于得以分别与被迫曾一度提出过离婚的妻子文静，和三个女儿，还有那个还没有出生就在“主席那里备过案”的小儿子毛弟，以及女婿、儿媳和孙儿、重孙儿陆续团聚或重新团聚。欢声笑语不时传出，可谓其乐融融。只是毕竟已是垂暮老人，还在秦城时种种老年性疾病陆续出现，曾做过几次手术；到江阴后不久，更查出了极可怕的胰腺癌，而且发展很快，只好住进了江阴市医院。在这期间，张曾做过一个梦，醒来后告诉了陪伴着他的家里人，一次张的大女儿来看我，说起了她爸爸的这个梦。我细细想想，以为如此奇特的梦，似乎正反映着张离开这个世界时的一种心境，特转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当时张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因剧痛，只好贴止痛膏才得以勉强入睡。这一天是2005年一月二十七日。清晨，病危中的老人忽而笑着醒来，说他刚才做了个梦，梦见的竟是久违了的大海。是的，他想起来了，他少年时代曾那样向往大海，倾慕大海，还写过题为《海的渴慕》的文章：“我渴慕着看到大海，更渴慕在它胸膛上预言暴风雨来临的海燕的生活……”只是这回梦中见到的大海少了些明丽的色彩，茫茫中只见一团圆盘形的波浪飞速滚来、滚来。忽而波浪中跳出了一个人，定睛看时，竟是邓小平！邓一边走一边说：现在我没有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去找主席，主席不肯见，说他来有什么好说呢？还不是黑猫、白猫那一套！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这几个人相互斗来斗去，都那么些年了，还是不要去干扰主席了吧。邓转而对张说：所以我来找你，主席最听你的话，你就帮我到主席那里去说一声，让我去见一次吧。张回答说：可主席还没有叫我去，我又不能自己去；就是去了，又能帮你说些什么呢？说着就笑，笑着就醒了过来。

待到清醒过来后再想想，张觉得这梦做得有些蹊跷，很可能是我真的要去见主席了吧？是的，也该走了。主席不是说过吗：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都八十八了，还不该走？但一想到死，就感到惭愧，非常惭愧。已经吹出去了，说是要写一部《毛泽东传》的，也曾构想过几次，但就是没有动笔，哪有脸去见主席呀！唯一直接写主席的，只有年轻时那支《毛泽东之歌》，偏又写得那样幼稚。记得1958年那次随柯老到杭州去见主席，柯老介绍时说：他就是张春桥，《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当时心里很紧张，担心主席会批评。主席倒是没有批评，还笑着说了声：呵，你还会写诗？看样子主席对我写的那支歌还有些喜欢，至少不反感吧？这么说我还可以唱着这支歌去见主席？是的，还可以唱……

于是我猜想，这个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老人，便在心里唱着《毛泽东之歌》上了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着暴风雨……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做过这个梦以后又过了八十四天，即到了2005年四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心脏终于停止了搏动，结束了他注定要被后人争议不休的一生。

（全文完）

□ 原载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